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六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三四期 ——
（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2a）

【一家之言】	林彪事件中的神秘汪东兴	陈益南
【文革往事】	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胡楠仁
【当事者说】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刘 岩
【文革回顾】	痛忆粮食部请查“五一六”	陈其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一家之言】

林彪事件中的神秘汪东兴

• 陈益南 •

—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中，发生了借“论天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而猛批张春桥的事件。这个事件，确是当时军队方面对文革激进派深为不满而蓄意发动、并得到很多地方老干部支持的一次进攻性较量。进攻的步骤，有如当时康生的几句恶评：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之中，吴法宪并没有造谣，但汪东兴则确是点了火。然而，此事的结局，倒下的不是张春桥，而是所谓林彪集团。

陈伯达首当其冲，瞬间即被打入零册；军队高层的黄、吴、叶、李、邱，由此受到追究，被迫没完没了作检讨。之中，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的那位黄（克诚）总长一样，也是最后才上山，并没有介入前段会议，但他也成了受煎熬的对象。最后，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折戟沉沙，黄、吴、李、邱，则跟着全部陷入地狱。

甚至，完全与“林彪集团”无关，仅仅是因在河北及保定文革高潮中，与陈伯达有些工作

往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也被株连撤职关押。但是，积极参与批张春桥事件的“主犯”之一汪东兴，却竟然安然无恙。

当毛泽东对陈伯达大发雷霆后，汪东兴仅先后作了二份几百个字的检讨，居然便得以轻松解脱，并从此太平无事，而且日后还步步高升，官越做越大。这事，有些人费解。连当时正参加庐山会议的王洪文，都深感奇怪。庐山会议后段的一天晚上，江青召见了张春桥、王洪文等上海帮人员。在召见中，王洪文当面向江青提出一个疑问：“东兴同志为什么要那样发言？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啊！”

对此，当时江青即很轻描淡写的回答：“哦，老汪吗？他也收到了一份材料，不过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动。那天在华北组的会上，听了陈伯达的发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老汪他已向主席作了检讨”。（徐景贤：《十年一梦》）江青一口一个“老汪”，充分显露了，当时的汪东兴仍与毛泽东存在着亲密关系。不过，照历代官场规律看，一个首脑人物，一般是不会容许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外边的人联系太密、更绝不会容忍其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

然而，在庐山会议中，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队长，汪东兴却居然敢大咧咧地与“林彪集团”成员密切往来，互通情报，并且与他们策划并发动了突袭张春桥的中央政治事件。事后，汪东兴却能够丝毫不被毛泽东追究，仍能继续安安稳稳做他的“大内总管”！曾让无数人丢官、掉脑袋的官场潜规则，似乎对汪东兴不起作用。

有些文章说，是因为毛泽东喜欢用旧人在身边，认为对旧人他了解些，平日用惯了汪东兴，所以，即便汪东兴卷入了“林彪集团”的活动，但只要汪事后坦白交待了，作了检讨，便可以放过，继续使用。然而，毛泽东这方面的雅量，似乎没有什么历史事实能予以支持。相反，显现决绝无情之官场规则的情况，却不乏见。例如，毛泽东对他原来的秘书周小舟、陈伯达，就丝毫没有有什么恋旧之说。

众所周知，周小舟原本是毛泽东很赏识的才子。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毛泽东还在与周小舟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并宽容周对大跃进的激烈批评，对他人传言周是什么“湖南集团”，很不以为然，反而笑说自己与小舟一样，也是“湖南集团”之人。但是，没有几天，当毛得知周小舟与彭德怀、黄克诚在庐山上往来后，便即刻变脸，毫不容情地将仅仅尚只是候补中委的周小舟，也打入反党集团。

再说陈伯达，他长期是毛泽东的一支笔，还对毛有过一件天大功劳：在敌机轰炸解放区毛泽东住所时，陈伯达冒死营救了毛泽东；在文革的发动与初期，陈伯达更是毛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然而，当他在得知陈伯达与林彪等人往来密切后，毛便勃然翻脸不认人了，竟然不顾历史，怒说与陈“几十年从来没有很好配合过”，借陈伯达编了论天才语录小册子等小事，就一巴掌将他从中央第四号地位，直接撵进了图圈。因此，以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之前及之中的表现，以他与“林彪集团”往来密切的事实，若以“背主”之罪来衡量，汪东兴原本将有的结局，应是惨境难逃。

然而，汪东兴不仅没有因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垮台，相反，他的政治地位还更加稳固：中共“九大”汪东兴尚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彪事件后的“十大”中，他却反而得以晋升为政治局委员。而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度，显然也更为加重，包括将自己的许多个人私事都交给了汪处理。如毛泽东与其机要秘书张玉凤发生争吵，都是由汪东兴从中调解、劝说；甚至，连毛泽东身边的某位女青年上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手续，也都是由汪东兴经手填表办理。（沈容：《红色记忆》）

历史已表明，毛泽东既容不得身边的人“背叛”他，也常对他人长久记仇而不肯释怀（长征时林彪等人举荐彭德怀欲取代毛泽东出来全权指挥军事一事，毛认为是彭的主意，结果从会理会议起，此后二十多年间，毛都将此事数次端出来，指责彭德怀），但是，他为何却又能毫不计较汪东兴与“林彪集团”的往来及汪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而且，事后还让汪东兴升官晋级呢？

二

现在看来，此事极有一种可能：即汪东兴与“林彪集团”的密切往来，确是在执行某种任务。从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中，似能看到这种可能的某些蛛丝马迹：

据邱会作说，汪东兴与林彪集团人员突然往来密切，是在1968年杨成武倒台之后开始的。在“九大”之后，汪则更是主动向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靠拢，往办事组打电话，经常与他们一起聊天、“吹牛皮”“侃大山”，并不时向他们透露一些毛泽东对有关事情的指示。而且，还常向黄、吴、李、邱谈论毛泽东与江青的私事，极力宣传毛泽东与江青“完全是两回事”。（《邱会作回忆录》P 727）

特别是“九大”开幕前，汪东兴病了，黄、吴、李、邱去医院看他。汪则因毛泽东、江青都没有来看他，竟然是又哭又骂，说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要我了”，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很大不敬，以获得黄、吴、李、邱的同情。（《邱会作回忆录》P 616）

在那个年代居然敢私下谈论毛泽东的私生活、“生活作风”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连邱会作这样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此类个人隐私，当时听了都很吃惊，且在过了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都不敢详说。然而，汪东兴那时就敢肆无忌惮对人说道。凭什么，他有这个胆？

当时，由于汪东兴的积极靠拢，林彪、叶群及黄永胜等人便完全视汪东兴为他们圈子内的人了。以至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之际，当25日下午林彪去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时，原本在家的叶群，特地还追赶上林彪的座车，提醒林彪，“如果今天有什么麻烦，一定要保汪东兴”。（《邱会作回忆录》P 709）

民间有所谓“被他人卖了，却还帮着他人数钱”的戏谑之说，想不到贵为副统帅的夫人，也演绎了一回这个凄惨的笑话。“林彪集团”临到翻车之际，都还认为汪东兴是他们圈子里的干将。而毛泽东则在林彪事件后，为汪加官晋级，增加了对汪东兴的信任，直到毛自己去世。这真是汪东兴两面派角色的戏，演得出色吗？但是，敢拿毛泽东的信息，去换取“林彪集团”的好感，真要演好这戏，恐怕比在百米高空上走钢索的难度还要大。难道处世精明的汪东兴，会生出这等天大风险之买卖的想法？他真有这个能耐？

三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后的某些情况，似也有些不合常理、耐人寻味之迹象。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面止住矛头指向张春桥的会议浪潮后。第二天，即26日下午，按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康生、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与汪东兴开会理清前段会议情况。会上，康生指着汪东兴说：“你汪东兴所在的华北组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了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担，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在华北组起哄！”汪东兴却没有看康生，没有吭声，也没有低头折服的样子。（《邱会作回忆录》P 711）

康生说汪东兴“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你汪东兴戴上，你敢做不敢担”，看来是因为庐山上的反张春桥舆论大潮，对他也曾有过很大的压力，此时，他便拿汪在前段的表现一事出出气。然而，汪东兴对康生气势汹汹的指责，却毫不在乎。显然，如没有某种底气，汪东兴不可能这样潇洒。庐山会议风云突然逆转后，汪东兴做过二次书面检讨。但汪东兴这二次检讨的出台，除了是作为态度转折的桥梁，使汪能对前段的“点火”行为，向中央与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做出一个面子上的交代外，则可能还有其他特别意义。

第一次检讨，是在8月27日。检讨说“我（汪东兴）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仅仅一些套话，但毛泽东看过后，就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于是，汪东兴的检讨书，立即经周恩来批阅修改后印发给与会人员了。而在此前一天，汪东兴对康生的指责还无动于衷，而第二天却又立即写出检讨，沉痛认错。这是什么意思？

汪东兴当时仍天天守在毛泽东身边，如果真要认错，或者说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那么在25日下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后，汪就应该会作检讨了，而不会在26日周恩来召集的会上，还显出根本不理会康生指责的无畏神情。看来，是因为26日、27日二天周恩来召集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根本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认为是行使正常的党员发言权利，而在抗争。于是，汪东兴的检讨便出来了，并印发中央全会。

随即，第二天即28日，周恩来就直接点名，要吴法宪写检讨。当时，吴、李、邱等人尚不明就里，还在抱怨抵触。但汪东兴的检讨，使周恩来督促吴法宪有了理由，因而，吴法宪不得不随汪之后，于28日，被迫也交出了检讨。虽然，吴法宪的检讨，只说是自己对林彪讲话的理解出了偏差，是自己个人犯了错误，既没谈陈伯达，也没涉及他人。但是，有了汪、吴的检讨，无疑，就是对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们有了标示：前段会议中批张春桥，是性质错了。

汪东兴的第二次检讨，是在9月15日，随同毛泽东从庐山下山，抵达武昌东湖宾馆住下后写的。汪在这次检讨中，重点是“揭批”陈伯达，说自己上了陈的当、被陈伯达利用欺骗了。对汪东兴的第二份检讨，毛泽东立即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批示：“政治局传阅。”、“此件（即汪的检讨书）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毛泽东这个批示的用语，释放了二个信号。一方面表明，汪东兴仍是他值得信任的人；二则是为庐山会议上曾发动批张春桥的“林彪集团”人员，树了一个检讨即可从宽的样榜。

当时，虽然毛泽东将庐山会议风势扭转了，并将陈伯达拉出来，作为打击目标，做了警示“猴子”们的“鸡”。但是，“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除吴法宪一人稍稍作了个浅浅的检讨外，其他人却仍都根本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甚至，就是林彪本人，也不认为吴法宪有什么错误，顶多只是说“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鸡”给杀了，但“猴子”们似乎并不在乎。

现在能看到资料表明，显然，当时毛泽东整陈伯达的初衷，要的就是使黄、吴、叶、李、邱几员干将能被震慑、认错的效果，从而让黄、吴、李、邱四人以后不敢与林彪走得太近。可是，直到庐山会议9月6日结束，毛泽东的这一目标却仍未能实现。最后，毛泽东只好对庐山之事留下一个尾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邱会作回忆录》P723）

这样，汪东兴的第二次检讨，应时出台了。在北京的周恩来，立即找黄、吴、李、邱等人谈话，传达了汪的检讨与毛的批示，而且很明确的对他们说：“汪东兴做了二次检讨，这很好。

你们几个也应该做出检讨。”“虽然主席说是等你们想通了再写检讨，但实际上主席是希望看到你们的检讨。”（《邱会作回忆录》P 733）

虽然，即便这样，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仍不认为自己需要写检讨。但是，缺口还是被打开了。因有汪东兴作检讨就被“解放”的先例，9月底、与10月初，吴法宪、叶群便率先分别向毛泽东送交了他们的检讨书，希望由此而也被解放。不料，半个月后，吴法宪、叶群的检讨，根本没能获得汪东兴的待遇，换来的却是毛泽东一大段劈头盖脸的严厉批语：“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几百个中央委员……”从而，不仅给庐山会议鼓动批张春桥的行为正式定了性（发难、欺骗），并且将黄、吴、叶、李、邱等人，从此得以在政治上全数定到了被告席上。有所谓“引蛇出洞”之计，然引蛇之法，却各有特色。

四

庐山之事，使回到了北京的黄、吴、李、邱，精神上不能不逐渐陷入紧张状态，并生出惶惶之感。然而，汪东兴的心情呢？从1971年3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中南海毛的住处，与黄、吴、李、邱、汪及李德生、纪登奎谈话时，汪东兴与毛泽东之间具有的轻松、随便神态，则可窥知一斑。

当毛泽东在谈话后指示，要周恩来带黄、吴、李、邱、汪、李、纪去北戴河，向林彪征求、商议筹备召开最后解决庐山问题的中央会议一事时，当毛的话音一落，汪东兴便对毛泽东说：“我就不去了吧？家里的事很忙。”完全是一副庐山问题的局外人、且与毛关系很亲密的轻松口吻。对汪东兴的问话，毛泽东也显出很随便、亲切的态度，并不以为汪这样做是犯上：“你不是也沾了边吗？，好，不去也行，但做自我批评还是有必要，有好处。”（《邱会作回忆录》P 757）

汪东兴前段时间与林彪及黄、吴、叶、李、邱打得那样火热，对此，即便汪东兴没有庐山会议中积极鼓动参入批张春桥之事，仅仅就凭他向黄、吴、李、邱讲了那么多毛泽东的个人隐私之事，而黄、吴、李、邱也随时都可能将这些情况予以揭发。处在如此险境之际，照理，在毛的面前，汪东兴应只会是心虚有惧吧。但是，如上所述，汪东兴却极其坦然自如，神情轻快，根本没有一个头上顶着个随时会炸的巨雷之人，常有的那种胆怯神态。这又是为什么？

在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所写的回忆录中，对于汪东兴，他们都很气愤，认为当年正是汪东兴误导他们陷入了泥潭：若不是汪东兴经常向他们透露毛泽东的事与批示、说毛泽东与江青是“两回事”；若不是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中高调鼓动，他们又如何会贸然掀起批张春桥的浪潮。可是，待他们知道毛泽东其实是很信任江青时，大错已铸。

然而，他们直到去世，也许还不明了，汪东兴的一切“误导”，其深层缘由，可能比人们诸多想象到的，还要复杂。对于汪东兴的为人，邱会作在其回忆录中，有二点评说：一、喜欢装腔作势；二、肚子里有不少事。汪东兴的肚子里，的确有着太多的秘密，因而，他给世人也展示了很多的悬疑。

五

在林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汪东兴究竟有着怎样的实际身份？目前，还没有、也难以有确实的资料，来揭示历史的真相，来显露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中的准确面貌。但是，从以往有过的某些历史，加之文革中发生的很多情况看，却不能不使人猜测：在林彪事件中，有可能，汪东兴是在扮演某种卧底类的角色。

很多人不知道，与毛泽东身边绝大多数秘书、警卫、生活方面工作人员身份不同的是，汪东兴原本就具有中共肃特与情报系统干部的资深经历。早在延安之初，他居然是在延安中央医院政委任上，主动要求转行从事肃特与保卫工作的。由此说明，汪个人对特工业务，是有着很大的兴趣。转行后，汪东兴即接受了中央社会部系统的情报、保卫与肃特工作专业训练（中社部训练班第七期），后来，很长时间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一职。

而中共社会部的四大任务之一，便是“有计划地派遣同志和同情分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可能打入敌人的内部，利用敌人中一切可能利用的人，从加强敌人内部的工作达到保卫自己。”（郝在今：《中国秘密战》）虽然，时代不同了，党内同志并非敌人。然而，建国后二十年来，经过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右派运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以及文革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及大批党政要人，收拾王、关、戚，拿下杨、余、傅等不间断的种种斗争，这样，“敌人”的概念，便不可能不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而文革以来，各派政治势力，也无一不是希望了解中央高层或其他宗派圈子内的情况，总是千方百计欲获取自己想要的消息。

在这种态势与氛围下，对“社会部”业务熟门熟路的汪东兴，若为毛泽东执行卧底类任务，也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文革中，竟还兼了若干审查中央要员的“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这就表明，他在原中央社会部的经历，尚在直接发挥作用。在中共党内高层，是不是存在过对不同意见之党内他人，而动用特别方式获取对方情况的事情呢？

曾做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曾透露，1937年他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就负有监视当时尚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的兼职使命。至于是谁交给他的这种任务，伍没有说。张国焘当时是伍修权的上级，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伍却受命要监视张。此事，表明了中共党内高层，的确也发生过用特工方式，以获得他人信息的事情。

至于毛泽东本人，众所周知，他对肃清内部敌人、甚至肃清只是内部反对派同志这类事，历来都是很重视的。但是，他是否派出什么人去做内部同志卧底的事情，却似没有所闻。不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延安时曾亲自兼任过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职务：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的任务，就是全面负责对敌我友的情报调查与研究工作。可见，毛泽东对情报调查、特工业务是甚为重视，也必是熟悉的。有时，他还亲自参与这方面工作。

例如，1940年，国民党陕西省中统室主任李茂堂，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毛泽东得知后，亲自指示中共情报机构与李茂堂联系，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后来，李茂堂又秘密到了延安，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对此，毛泽东也亲自予以批准。（郝在今：《中国秘密战》）

而张秀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一书中，更披露了一个让人有些惊骇的历史细节：1953年，毛泽东要高岗去查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一下1929年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这说明，毛泽东对获取、掌握党内二把手的信息，的确是很感兴趣，为达此目的，也有过一些措施。因此，在文革中，当杨成武垮台后，由林彪的几位爱将黄、吴、李、邱主持了军委工作，而全国各省政权又先后大部分为军队将领左右之际，毛泽东授意汪东兴打入“林彪集团”，以求掌握“林彪集团”的动态，并非没有可能。

如确存在这种可能，那么，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中做出的所谓“点火”行为，就更不会是什么他“头脑发热，就说了那番话”而已。相反，原本很可能是毛泽东为测试某种情况，而让汪

放出的假气球。只是由此导致后来庐山会议发生了“批张”（春桥）几乎一边倒的熊熊烈火，有使毛对大局失控之迹象，毛才只好亲自出面灭火，汪东兴便也从此割断了与“林彪集团”的往来。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毛泽东逆转了庐山会议的风向后，汪东兴便做了逃兵，拼命想从“林彪集团”中逃出去。但是，邱会作可能错了！

1949年底的某次聚会中，投共的原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看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也出席了聚会，便惊异地问熊：“熊老弟也起义了？”站在一旁的周恩来，便笑着说：“熊向晖同志不是起义，而是归队！”张治中顿时愕然。的确，熊向晖从来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不是国民党。实际上，庐山会议8月25日之后的汪东兴，其所以嘎然中断与黄吴李邱等人的往来，并非是为着“逃出”林彪圈子，而显然是归队！

~~~~~

## 【文革往事】

### 红卫兵报刊幕后往事

• 胡楠仁 •

“文革”10年间，异乎寻常的现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这与全国官方报刊种数锐减恰恰相反。据初步估算，类似《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这样的红卫兵报刊，竟有5000种之多。这些报刊是山头林立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喉舌，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浪潮下的变异文化现象。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创、发展、鼎盛、衰亡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轶闻。

#### ◇ 红卫兵小报让人认识了“五大造反领袖”

1966年5月底，中国的政治气候比自然节律提前进入燥热期。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8月1日，毛泽东写出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孩子们的行动。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传播。8月18日，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联”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雪片般撒向街头。他们迫切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而生。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这两份报都是八开四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有严重的打砸抢行动，继而又流露出维护“走资派”的倾向，该组织仅生存了一个多月就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刽子手”而解体。它所办的报纸，也只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干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销声匿迹前共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红旗》，北京师

范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相继诞生。

由于这些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报纸逐渐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发行量很大，地质学院《东方红》报销量曾多达10万份以上。北京大学的《新北大》报，虽然在8月22日就已经创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现，与红卫兵小报的模式不尽相同。该报因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名而骤然显赫，后来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通过《东方红》、《红旗》、《井冈山》、《新北大》这些高校红卫兵的小报，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也由此领略了他们煽惑鼓噪的才华。

#### ◇ 为漏排一个“的”字，三番五次作检讨

1966年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办的行业造反报纸。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空泛，“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比起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小报，差错率小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内中原因说出来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觉得悲哀。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报刊版面上的任何错别字，都可能招致“反动”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每一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言论的引文。

在翻阅昔日红卫兵小报时，笔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的几期，因为此前刊登毛主席语录时漏排了一个“的”字，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声明检讨，“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呵斥对立派别不得借此“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革”时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 ◇ 张春桥领导的《解放日报》也“犯下罪行”

红卫兵报刊的另一个来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上至省，下至地、县及本单位机关报。1967年1月3日，面对各级党委已难以继续领导宣传工作的状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就在中央发出“停刊闹革命”的当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号——原《解放军报社》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座的还有聂元梓。张春桥神秘地布置说：“《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赶回上海。

1月4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当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杀气腾腾地宣布“接管了《文汇报》”，“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对于《文汇报》的被造反，人们颇有几分惶惑：“文革”的导火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在《文汇报》，这家报纸如何又“罪恶滔天”了呢？未等人们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

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自1962年以来，“窃据《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为上海市委分管



宣传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长期以来一直领导着《解放日报》，如果说这份报纸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他这个领导又如何洗刷得干净呢？

#### ◇ 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枪杆子之争”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陷入了夺权、“新生”的混乱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夺权都能找到张春桥这样的硬后台，因此在你争我夺中，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由军队暂时控制报社，但情况并没有立即好转。

在中央发出这一决定时，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市“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占据，他们刁难阻挠军管，后又用暴力驱逐来社的解放军人员。当时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支左办公室，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副组长，联合支左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西宁驻军调动部队夺占《青海日报》时，群众组织与部队发生武装冲突，造成群众和部队伤亡377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日报》事件”。事后，林彪、江青乘机把此事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指责赵永夫是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予以逮捕。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了“枪杆子之争”。

在广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时，几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成的“省革联”，来到《广州日报》夺权，将报纸改为传播“省革联”声音的《新广州日报》。到了2月28日，“省革联”的夺权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3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在其编印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夺权的轩然大波。4月10日晚，广州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冲击广州日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就这样闹到了5月15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报社，《广州日报》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控制省报为一个组织私有的现象，并不多见。被造反派或红卫兵组织改造为红卫兵小报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级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数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300种以上。当年周恩来曾询问过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得到的答案是30多种。全国红卫兵小报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10几种。但西藏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从办报人的职业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平反出狱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如此五花八门，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 ◇ “走资派”街头售卖红卫兵小报

红卫兵报刊开始发行时，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因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派，通过邮发的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报纸——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人员来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该处代为发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报》，并要求此后要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称之为“《解放日报》放毒

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天后，“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进驻解放日报社。

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迅速聚集了50万人，把解放日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后来一段日子里，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战报》“押解而出”的“奇观”。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街头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 ◇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在全国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首都红卫兵》。说它影响大，和它创办者的名声有直接关系——它的创办者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正式出版。

《首都红卫兵》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初创时举步维艰，编报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由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随着“三司”的名声日益显赫，情况有所改观。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学生，因此，“三司”一诞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形形色色的小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充中央文革小组的捍卫力量。

那段时间里，《首都红卫兵》的文章时不时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转载。各地红卫兵报刊的转载更是频繁，有些言论甚至被当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于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谁与之看齐，谁便成为“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谁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大联合。

毛泽东在《首都红卫兵》这篇社论标题上划了铅笔红圈，要求各大报刊立即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立即响应。被“两报一刊”转载，在当时是最高的殊荣，《首都红卫兵》报从此声名鹊起。该文的执笔者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工作。令人遗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国的形势并未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大联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内战”的深谷。

#### ◇ 红卫兵小报如何由盛转衰

说《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多，是

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由于“三司”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的联络站，煽动造反，《首都红卫兵》报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联络站覆盖了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等40多个城市。《首都红卫兵》还在各地办分刊，在北京还有中学中专版。这些分店和总店共同发行报纸的数量，难以统计，据粗略估算，鼎盛时期当不少于50万份。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分店，各自为战，难免与总店有不谐之调，以致在“内战”最酣之际，因支持地方的派别不同，互相声明攻击，分刊批本刊，本刊宣布分刊为非法的“热闹”场景屡屡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但是，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造反领袖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泽东闻讯震怒，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红卫兵造反派横冲直撞的时代，也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了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

#### ◇ 毛泽东笑看小报，兴致盎然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与日俱增的红卫兵小报的关注，不亚于此前对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曾问周世钊：“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回答：“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乐意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道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以报道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让他们告急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那天，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发生在长沙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的武斗。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如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对此看得很仔细，各不同派别办的小报都要看。

两天后的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武汉。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决“全面内战”局势的办法来。所到之处，他仍然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当地红卫兵小报。这成为他当时调研的一种方法。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毛泽东被迫中断了在武汉的实验，转赴上海。在上海，毛泽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依然阅读大量的红卫兵小报。

在上海“工总司”的报上，毛泽东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段指示不久即被传布，反映了毛泽东由“乱”到“治”的思考，开始扭转“全面内战”的局势，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泽东来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谈话中，他依旧兴致盎然地引用着从红卫兵小报上得到的见闻。当筹备小组汇报到南昌附近发生武斗时，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接着，他又总结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6、7、8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看出问题揭开来了，事情好解决了。

对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泽东也通过阅看那里的红卫兵小报了解情况。1968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是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 ◇ 攻击中央领导人的“群丑图”

在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也会说到中国的红卫兵小报。1967年6月初，毛泽东在会见东南亚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曾这样问道：我们的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外宾说：我见到了。它的销量达10万，有时甚至超过10万。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说，最好把中国的报纸销售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要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售总数还多。毛泽东点头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在阅看红卫兵五花八门的小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做法。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突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就问道：“你手里是什么？”傅崇碧说：“是刚出的小报，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我看看行吗？”傅马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开，看到一份载有“群丑图”的红卫兵小报。在这幅图中，画着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一人坐一顶，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示意下，红卫兵们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然而，那份“群丑图”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撒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在那段失控的状态下，已经无力制止和改变红卫兵小报的泛滥和狂热言论的传播。几年以后，“群丑图”的作者，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澜的底层。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 ◇ “鬼见愁”对联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烟海的红卫兵小报中，有一份用年轻的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

浸透了编者和作者的血和泪。让这份报纸名闻遐迩的，就是该报创刊号上的《出身论》，以及作者后来的悲惨下场。《出身论》的作者是失学青年遇罗克。他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的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那以后，遇罗克陷入了苦恼的深思中。1960年，门门功课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却没有任何大学录取，问题就在家庭出身的阴影。

当时十二三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1966年七八月间掀起一阵“血统论”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随即风靡全国。围绕这幅“鬼见愁”对联，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天桥剧场等地，召开了名为辩论实则一边倒的大会。与红卫兵挥舞的皮带相伴随的，是社会上迅速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不要说参加红卫兵须严格审查出身，就连买一些紧俏商品，售货员也会问一句：“什么出身？”若是“红五类”，可优先供给，若是“黑五类”就没份了。

面对狂热的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遇罗克写道：“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当站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仲秋10月，《出身论》被油印成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抄录，引起了更多人的议论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出身论》深表赞同。他们找到遇罗克和他的弟弟，商议筹办《中学文革报》。不久，创刊号面世，《出身论》赫然刊于头版，文章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创刊号开印3万份，刚拿到街上就被一抢而光。重开机又印了6万份，几天内又销售告罄。《中学文革报》从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有的人还能忆起当年人们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盛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的铁栅栏外，拥挤的人群把手伸进去，极力想买到一份，一张报纸被两个人抢作两截，仍互不相让地争吵着。持不同观点的一些红卫兵赶来，撕毁了一些报纸，立即引起人们的愤怒：“为什么撕报，不同意可以写文章辩论嘛！”在斥责声中，《中学文革报》继续出售，更加抢手。

但这篇文章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都以《中学文革报》为靶子，开展了大批判。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经过几十次审讯，戴上重镣和背铐的遇罗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片狂热口号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身挂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这年，他才27岁。

《中学文革报》还有一个殉葬者，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小丹。她因参加该报文章的撰写，并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18个质问，被红卫兵用铁丝网捆住全身，从四层楼顶

扔下来，摔死了。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它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仍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检讨。

□ 《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

~~~~~

【当事者说】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 刘 岩 •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1972年6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兴趣。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许多报刊书籍，纷纷刊载有关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及整个追悼会举行情况的逸闻，其中有些关键性情节与实际出入较大，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出版物和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以讹传讹，将一些杜撰的虚假情节当做历史事实。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作为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执笔人和参加陈毅同志治丧活动全过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当时所见、所闻和所记载下来的东西，贡献出来，供有关方面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

一、临时受领撰写悼词任务

1972年1月7日晨，总政治部的班车刚开进旃檀寺办公楼，我就被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领导同志叫去交待任务：立即去干部档案室借出陈毅同志的档案，在办公大楼门前等候王迪康秘书长，然后随他前往三座门（军委办公地）执行任务。我问“是什么任务？”他说：“上级没有告诉，去了就会知道的。”

上午8点多钟，参加会议的人员在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集合，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向大家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月6日）11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师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他是治丧小组成员）同志以外，还有军委办公厅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涛同志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同志。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新华社有三位，军委办公厅有两位，总政治部就去了我自己。这样，撰写陈毅同志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二、对陈毅同志的评价上面没有人愿意定调

任务布置以后，分三摊开始工作。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治丧小组成员）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

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王迪康秘书长对我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在场的几位领导人确有难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风浪随时都有袭来的可能，对陈老总这样一位“浪尖”上的人物，评价高了或低了说不定都会带来风险。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任免干事，属于“群众”行列。那时搞政治运动有一条规矩，不准“矛头向下整群众”，我没有政治上的顾虑，所以我就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我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四名，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同志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三、陈毅悼词稿基本上是参考了罗李两篇悼词写成的

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人同我在一起研究讨论，加上陈老总的干部档案材料里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鉴定、结论等文字的东西，所以我交出的悼词草稿，实际上是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的写法，加上我自己平时对陈老总的良好印象而形成的。在草拟过程中，悼词的格式和评价的措词，这两点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格式问题比照着罗、李悼词的结构填写就是了，评价措词基本上与给活人写鉴定差不多，而我在军委办事组干部室和总政干部部任免处工作几年，常为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写鉴定，难的是篇幅的把握。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悼词篇幅的长短应是规格的体现，陈老总的悼词到底写多大篇幅才符合“规格略高于李天佑”的精神，这一点费的周折比较多，翻来覆去的几次修改，主要是在字数上考虑。1970年10月5日《解放军报》刊登的，由吴法宪为李天佑所致悼词共246个字，我想“略多于”这个字数，比如说多写50%，也只能写370个字，我所设想的内容根本容纳不下，但超过得太多又不符合“略高于”的原则，斟酌再三的结果，决定按李天佑悼词报载字数的两倍左右来写，在段落结构的安排上，尽量简化经历部分，以便将节省的字数用于写评价。初稿中简历只用了157个字，占全篇幅的27.7%，（罗帅悼词中的简历部分占了全篇的39%、李天佑占37%）。下午我把初稿交给王秘书长审示，他口头提了几点文字方面的意见，对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动笔在稿子上修改。我抄正后他交给在场其他两位领导同志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同志代军委草拟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件稿子经治丧小组通过，然后《请示》进行打印，悼词未打印，将手抄稿附在《请示》件后面，由李德生同志签名“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叶剑英同志于“一月八日三时廿分”签名“呈总理阅示”。至此，我起草悼词的任务即告完成。

四、悼词的修改情况

为便于有兴趣的读者研究，这里不妨将566字的悼词原稿抄录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因患重病，久治不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刊载：1月8日，周总理“审改对陈毅的悼词稿，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际国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1）毛泽东阅后删去功过评价等补写文字”。（2）据了解，毛主席在删改时批了两段文字：“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前面已作了结论，后面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9日，周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通过对陈毅的悼词”。（3）

1月1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共538个字，与上报草稿对照，删去49字，增写21字，实减28字。同日，新华社播发了周总理所致悼词全文，1月11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

五、追悼会的规格升级

中央军委在向党中央关于陈毅同志治丧请示中提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三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一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名单是：中央政治局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党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耿飚、郭玉峰、王良恩；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同志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北京市委吴德；军委各总部负责同志；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同志各1—2人；陈毅同志生前友好。

周总理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七人。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周总理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周恩来1972.1.8五时”。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九个字，其他四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总理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9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1月10日早饭后，参加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

堂送到现场。刚吃过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同志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总参管理局的一名士兵文书）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做的），八宝山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我把这三件事办完不一会儿，周总理就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这时总参通信兵头天临时架设在礼堂大门西侧小屋里的两部军线拨号电话，已经改成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周总理用它为追悼会作最后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追悼会由于毛主席的出席，规格马上就比原计划提高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叶剑英同志改为由周总理致悼词；二是增加了花圈数目，毛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周总理、康生、朱德、何香凝以及西哈努克等的花圈都是原计划中没有的；三是实际参加追悼会的人增加到1500名，领导人中新增加的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全国人大常委会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全国政协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顾明杨等。此外，原计划追悼会“不通知外宾”，后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夫人，也一左一右扶着毛主席入场出席了追悼会。

六、治丧活动的组织紧凑而有序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比较仓促，在他弥留之际没有对他的后事预先作安排，从他心脏停止跳动到开追悼会，中间只相隔87个小时，合三天半多一点；治丧计划的制定、悼词稿子的草拟等项工作，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然而，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掌握，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同志的严密组织，尽管因为毛主席临时决定出席追悼会而使计划突然改变，但是整个治丧活动进行得紧凑而秩序井然。当时，除了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里三个小组进行的工作以外，在301医院遗体告别场地和八宝山追悼会场，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会场取暖问题。开追悼会的1月10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做。火炉取暖带来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贵宾的休息室和追悼会大厅内，必须万无一失，保证安全，这样，不得不调防化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携带仪器进入八宝山，从8日晚炉子点火开始，昼夜检测，从而保证了厅、室内既达到要求的温度，又保持了空气洁净。追悼会于10日下午结束，三天的治丧活动进行得顺利，没有发生任何纰漏。据我所知，逝者的家属张茜同志，除了在追悼会前索看陈毅同志悼词的要求，因党中央没有将悼词的审定稿退给治丧小组而未能如愿以外，其他方面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大家都比较满意。

注释：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文革回顾】

痛忆粮食部请查“五一六”

• 陈其阵 •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十年浩劫的一项重要内容，粮食部是这场劫难的重灾区。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制造了一个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下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的“五一六”阴谋集团（以下简称“集团”）的冤、假、错案。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七人被打成“黑参谋”。我（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被打“集团”第五号人物。部内约780人中，约120人被打成“五一六”。连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折胳膊，两人被整死。

◇ 灾难起因

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樊省轩是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9月20日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一起开大会，欢迎他两派组织议定，各选派6人组成大联委执行机构服务组。朱、廖是4个服务组召集人（每派两人）中的两个。我是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派性尚未消除的情况下，樊从亲一派、疏远一派发展到支一派、压一派。我和一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我们只得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多数转回到他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我们，通过群众的口说我们写了八封信，告军代表的状，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我们检讨。我们拒作检讨。这使军代表感到背后有人支持，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1969年8月，国务院决定粮食部和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700余人到河北省固安县永定河畔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了那里。我是到干校的一员。1970年1月，樊得知要开展清查“五一六”的活动，“五一六”的攻击矛头之一就是解放军，反对军代表还不是“五一六”活动吗？1月18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和林彪的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均未说明出处）樊省轩在会上声称：“‘五一六’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要他们交代，将他们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他也是部大联委12名服务组成员之一。1966年“文革”初起时，部党组决定粮科院在京外的五个研究所人员进京参加运动，朱、殷遂来到北京。1968年2月，军代表说国务院指示，五个所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朱、殷跟所里人员一起回到原地。樊发动清查时，又把朱、殷揪回北京。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2月5日决定给我办“学习班”，隔离审查。

◇ 生不如死

审查我的专案组有5个人，组长是原市镇供应司的办事员（粮食部大批人员下放时，原司

局建制撤销，仿军队建制设连、班，这个人时任一个连的副指导员）。见面坐定以后，他领读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语录，然后宣布纪律：不许随便走出房间，去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为了保证安全，要我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我所带的东西，片纸未留。与此同时，派人到我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我家里搜查。3月13日，组长领读完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清查的语录后说：“军代表把问题的底和政策的底交给你：交代你的‘五一六’关系，交代的彻底，可以回到群众中去。”我一再申明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和“五一六”没有关系。专案组说我不老实，开始体罚，要我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不准直腰。5月下旬的一天，组长拿了几页纸，让我看第一页第一行，是“认罪书”几个字。又让我看末尾，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几个字。我如入五里雾中。这是军代表眼中粮食部“集团”的重要人物的字迹。我表示：我不知道他是“五一六”，我和他没有“五一六”关系。我不是“五一六”。组长说我冥顽不灵，“再不交代就要给你改善待遇了！”6月上旬，我被转移到离生活区200米以外的一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我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糊得严严的。与大屋相隔的隔壁上有一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一个火柴盒大小的活动纸片，用手掀开，便可看到屋内的一切。这是个瞭望孔。室内放一痰盂，供大小便用。一天给一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我出屋一次，倒屎尿，接一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来了个下马威，抡开膀臂，一连打我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你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组长动手外，还有一个组员帮打（以下称“帮手”）。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他们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找四五个人来。打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室内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我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把我的胯部以下至脚踝，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一样，两个多月没法迈步，走路得慢慢蹭。组长用铁炉钩子打我的手，打一下问一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最不能容忍的是骂：骂爹、骂妈，骂爷爷、骂奶奶，骂祖宗，骂八辈祖宗！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我没有自由、没有尊严、没有人样，生不如死。我多次想死，但死了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妻子、孩子是反革命家属，我死不起。

#### ◇ 攻心诱供

在使用多种手段摧残的同时，专案组人员不时使用“软”的一手：攻心诱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我耳闻目睹“同伙”如何“认罪”，以使我不再相信“攻守同盟”。8月12日专案组把我押进一间空屋，收听小喇叭转播的殷嵩义认罪实况。12月上旬，专案组组长领我在院内转了一圈，看到了原粮科院翻译胡××写的“认罪书”，承认是“五一六”，描述了经过。过了几天，专案组又把我押进一间空屋，收听“集团”另一个重要人物的认罪实况转播。他在供述“罪行”时，点了我的名，编造了“策划阴谋”时我说的话，这等于在群众大会上指认我是“五一六”。收听后，组长开导说，你上边的交代了，下边的也交代了，同伙都交代了，你想想怎么办吧？！我身受的打骂折磨难忍，军代表指定交代的不供认不行，那就认下来吧！于是我向专案组说参加了“五一六”，是1967年4月19日一个人跟我说，我同意参加的，把那天以后的活动都往“五一六”上挂，但是专案组穷追不舍，逼我交代的问题更多。没影的事编不出来，过不去。特别是我本清白，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在1965年12月初甚至告诉我要发展我入党了！我怎么能把“五一六”的黑帽子往自己头上按呢？我怎么和妻儿交代呀？不行。假坦白这条路不能走。专案组找我继续交代问题时，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前两天说是‘五一六’，那是假的。”组长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上来劈头盖脸地打。他的手指把我太阳穴的血管划破了，鲜血成串地滴到地上，我忙用手按住。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说：“把你以前交代的假情节给我改掉了！”我说：“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叫‘五一六’，不叫‘四一九’哇？”我的天，原来这“五一六”是5月16日（或以后）才有的，我编的日子早了。我急忙

表示：“我端正态度。”他说：“敬酒不吃，吃罚酒！”示意几个人走出监室。为了防止我再翻供，组长问我，跟你们活动的那伙人，你说谁不是‘五一六’吧？”我说了一个人名，这个人政治上成熟，是我尊敬和信赖的。组长说：“他交代了！”过了几个小时，一个连的副指导员到我的监室，拿出两页纸，遮遮掩掩，让我看第一行字，是“认罪书”，最后一行字是“五一六”分子×××。我无言以对。第二天，专案组又叫来两个人，一个是原机关团委副书记，一个是原政治部办公室科员，都是我的好友，看见他俩，我泣不成声。他俩语意双关地劝我“认清大势，抗是抗不过去的，都各奔前程了，争取个好出路吧！”我联想到早在半年前，我一位颇为敬重的部领导在三里河商业部礼堂批斗会上就编造说吴传启到粮食部和他策划阴谋，被迫招认是“集团”的“黑后台”。实际上他早在1967年4月就被群众组织打倒了，置于专案组监管之下，吴传启怎么到粮食部和他策划阴谋？这样的人都顶不住了，我顶得了吗？我多次申明：我13岁家乡得解放，是人民助学金供我到大学毕业。我热爱党，写过五次入党申请书，誓言把自己献给党。他们说他们是给他们忆苦思甜，上来就打。我被隔离之前，刺破手指，写了“永远忠于毛主席”的血书，专案组搜查问到：“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表达真心，如果看到我的心是红的，就相信我是革命的，是忠于毛主席的，我愿意剖腹！”他们又打又骂。血写的事实他们不信。只信墨写的谎言，那就编吧！决心沿着已招供的供词和专案人员逼供、诱供的线索，开动脑筋编造。

#### ◇ 屈招脱难

经过20多天的苦思苦想，我写出了“认罪书”。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叫我“认罪”。我照字宣读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开口说“1967年5月下旬，我先后经三人介绍，三次参加‘五一六’阴谋集团，参加经过和‘五一六’阴谋组织情况已经向学习班交代。下面交代我所犯的罪行和思想根源。”“三次参加”和“4月19日参加”的说法一样荒唐，可是专案组信以为真，因为除了“四一九”以外，其他的编造都没有真凭据对比，无法辨别真假。“认罪”以后，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我的待遇：可以给家里写信，可以和“学习班”的人一起到食堂买饭；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上厕所不必请假。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1971年3月15日，军代表在干校召开清查“五一六”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一位处级干部不以“五一六”分子看待。一位头目“暂不戴反革命帽子，以观后效”；宣布我“解除隔离，回到群众中去交代问题”。宣布粮科院一位翻译从严处理，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宣布郑志勋（后任国家粮食储备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态度恶劣、拒不交代问题，隔离审查。宽严大会以后，气氛逐渐缓和下来，专案组人员虽隔三岔五地找我，都以“想不起来”的托词回复，他们也不穷追猛打了。

#### ◇ 申诉雪冤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邱会作随之倒台。清查“五一六”“一个也不能漏”的纲领不再提出了，军代表没有往日的气势了。随着批林的深入，被打成“五一六”的同事们纷纷向商业部（1970年7月，原商、粮、供等四个单位正式合并为商业部，成立党的核心小组，行使党组的权力）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上访，反映粮食部清查逼、供、信，打人、体罚的严重情况。1972年6月，核心小组派人到固安五七干校调查。我于7月1日向专案组人员申明不是“五一六”，全部推翻了屈打成招的假供，开始给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原商业部军代表）写信，详述被整、被打的过程，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并多次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申诉冤屈，要求调查、处理粮食部军代表在清查中违反政策的问题。

在群众强烈反映和要求下，1973年1月13日，固安五七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商业部

党的核心小组多位成员到会。原粮食部副军代表翟梦僧先发言，声称原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承认犯有错误。犯了逼、供、信，扩大化，有的人被打得很重、致使身体受了伤，心情感到沉痛，给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宣布给41个人平反，另对被整的时间很长、有的被打得也很重的42人纠正错误，赔礼道歉。翟讲完，樊省轩发言，几乎和翟说了同样的话。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范子瑜也在会上讲了话，基调跟翟、樊讲的一样。会后讨论三天。被错整的同志均不同意“清查”的“方向、路线正确、成绩是主要的”提法，摆出大量事实、揭露军代表按林彪“一个也不能漏掉”和他的死党“心不能善、手不能软”的一套搞，纷纷贴大字报。这时，一位领导干部的家属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丈夫在监狱里每天只给喝三杯开水，如果再想喝，就得喝凉水。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在群众中传开了。2月28日翟梦僧也在干校传达了。被整的同志受到了鼓舞。以后在联系实际批林中，我和被错整的同志一起，把揭露军代表在“清查”中的恶行写成大字报，贴到了西单商业部大院，又在全部人员批判大会上的发言中列举。机关干部们看后、听后都感到震惊，军代表很被动，很难堪。

1973年5月1日，陈国栋参加游园活动，报纸上登了名字，随即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1月7日，陈在商业部和廖祝南、我等四人见面、谈话，说他“受党的委托”，协助处理粮食部“清查”的问题，要到固安干校和我们详谈。11月24日，陈国栋到干校与原粮食部副部长安法乾（时任干校党委副书记、后任粮食部副部长）一起，找朱相远、我等四人谈话，听取我们的意见。1974年1月14日至16日，陈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安法乾、翟梦僧和商业部政工组的陆柯（后任商业部干部司司长）、邵祖山（后任商业部五金交电化工局副局长）也参加了。安首先说：（注：引号内的文字均摘自当时的记录，下同）“11月份，党委在商业部开了一个会，核心小组范子瑜、郭士荣、樊省轩、柳垣（原四个单位的军代表——笔者注）、马敬夫、林永清参加。现在把会议纪要向大家传达一下：会议认为，范子瑜同志代表核心小组在1973年1月13日对我校清查的分析是正确的。”“清查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经清查，原粮食部没有发现‘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发现‘五一六’分子。”“在清查‘五一六’的工作中犯了逼、供、信，打人，扩大化的错误，特别是打人，有的人留了残疾，伤害了群众，影响了团结，错误是严重的。”“打人的错误主要由当时的校领导负责，打人的没有责任。”他说：“今天跟大家讲讲，还是商量，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原粮食部政治处的龚诚（行政16级转业干部）第一个发言。他说：“对‘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两句话我不同意。”“100多个同志受了非人的待遇。凭什么打掉我八颗牙齿？凭什么把我胳膊打折？我被关起三天，手就不能动了，饭拿来，用嘴从碗里舔，像狗吃食一样。我要撒尿，没办法，站在外边，憋得受不了。魏金娥（医务室女职工）看见了问：‘你在干什么？’我说：要小便，撒不出来呀，把裤子尿湿了，你帮帮忙吧！她帮我小便了一下。我半年没洗脚，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不能理发，不能刮脸。我是这样过日子的呀？”他泣不成声。在座的很多人流泪、抽泣。原储运司科员牛梦辰说：“咱们这儿打人，到现在还谈虎色变！我跟家人讲，不信。李×（五连指导员，原财委会15级处长）打李有发（原财委会办事员）100多个耳光，问：‘我打过你吗？’120人，谁没有一本辛酸账？”储运司科员范大林说：“我从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干校。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一挂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连续有80天，翟梦僧同志你量量两块砖的分量，你用手拿10分钟试试。打我，打折了几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逼我交代‘五一六’还不算。还叫我交代里通外国，说军代表那里有材料。现在军代表在这里，你把材料拿出来！我想寻死，又想，死了不行，死了，骨灰都没影了。没法，我承认。交代外国人名，我编不出来，最后从《参考消息》上找了一个跳高运动员的名字。”张强（原政治部17级干部，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说：“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粮食部副部长、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老红军）是后台，把大便打到裤子里。坐‘老虎凳’（把腿绑在长凳上，往脚下加砖）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原粮科院翻译胡××说：“×、殷认罪以后，让我交代‘五一六’，说‘×、殷交代了粮科院的五一六’，你是也是，不是也是。没法，我在9月说

参加了‘五一六’，认罪书是12月才写出来的，怎么写是别人告诉我的。写出后，叫我在会上认罪，然后贴大字报。我不愿贴，让我立功。这个大字报出来以后，使很多人受折磨。我说了假话，对不起同志们。杜子诚（原粮科院翻译，因被整，上吊身死）是个好同志，死了还扎个稻草人，召开批斗会。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厦门）去，拿了两张照片，说杜有作风问题。是谁要这样做的？”对含冤死去的人，无中生有，诋毁声誉，对模拟像批斗，亵渎逝者，良知何在？人性何在？殷嵩义死了，死因不明，连骨灰也没给保留。1973年樊省轩在和廖祝南的一次谈话中说，殷是1971年3月死的，死后，有关人员告诉了他，他没去现场。死时身上有逼、供、信，甚至严重逼、供、信的伤痕。殷已于1970年8月在群众大会上认罪，怎么会在半年后“自杀”呢？群众怀疑殷是翻供惹恼了专案人员，被打死了。大家要求调查其死因，公布真相。座谈会共有13位同志发言，一致要求军代表对“清查”中的错误认真检查、为被整成“五一六”的同志平反昭雪。同时认为，打人由领导负责，包起来，不对。各有各的账，打人情节恶劣的和组织者、幕后指挥者，应追究其责任。

#### ◇ 偿还欠账

1974年11月14日，商业部在政法干校礼堂召开大会，陈国栋和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均出席并在台上就座。大会由副部长高修主持，他说：“先由范子瑜同志代表中共商业部核心小组对清查‘五一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范在检查中说：“关于‘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问题。经查证，除程镇华（原北京商学院学生，1967年8月，因张贴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被商学院和国务院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多次批斗。1970年3月，商业部又在三里河礼堂召开大会批斗，为清查造势，会后期被北京市公安局押走）由有关部门继续审查外，原四个单位没有发现有‘五一六’组织，也没有发现有‘五一六’分子。”“由于核心小组成员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和干扰，在林贼及其死党‘一个也不能漏掉’、追组织、查表格，‘心不能善、手不能软’等反动谬论影响下，犯了错误。”“在打人方面，原粮食部打得很严重，被打的同志很多，有的同志被打得留下了残疾。”“在这里我代表核心小组向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赔礼道歉！”范检查完，高修宣布：“现在由樊省轩同志检查。”樊在检查中说：“清查‘五一六’一开始，我认为粮食部可能有‘五一六’。有些事情办不下去，我认为背后有捂‘五一六’的盖子。70年1月18日我讲话就说‘五一六’的魔爪伸进了粮食部。我对几个所谓的‘学习班’指示追查‘五一六’名单。”“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他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1974年底，军代表撤回了总后勤部，固安五七干校随之撤销，剩下的几十名干部陆续分配了工作。

1978年12月1日，商业部副部长姜习和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杨少桥（1979年粮食部恢复后仍任原职）找我和被打成“集团”第六号人物的崔秀春谈话。姜说：“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开，金（明）部长在参加。他想找同志们谈心，没时间，委托我们跟你们谈。原粮食部的清查运动有一些问题，怎么解决好，你们有什么意见，今天谈谈心，希望敞开思想。”我和崔秀春都敞开心扉，说了心里话。崔说得很动感情，声泪俱下。姜习同志表示把我们的意见向金明同志、向党组汇报。

1979年1月11日，商业部召开大会，金明同志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说要解决部里的遗留问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他说：“姚依林同志走时（从商业部调往中央）讲：‘有账的还账，谁想捂，捂不住；想盖，盖不住；想包，包不下来。账，早还好。’”金说：“有话就讲，充分发扬民主。”1979年2月27日，商业部在空军体育馆召开大会，部党组书记金明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清查‘五一六’是另搞一套，执行林彪、‘四人帮’路线，原粮食部‘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个假案、错案。有几个人被迫害致死，要组织专门小组，调查死因，召开平反大会。”因为金明很快调离了商业部，会上说的事情，没有来得及做。到了1983年整党、党员都要对“文革”中的作为作自我检查，然后重新登记。部整党领导机构要求在

“清查”中打过人的，都要向被打者赔礼道歉，取得谅解，否则，不予恢复组织生活。“组长”和“帮手”都找我，对当年动粗的行为认错，赔礼道歉。劫难虽已过40年，昔日有过同样遭遇的人偶聚一起，谈起往事，仍摇头叹息，伤痕太深了。但愿像粮食部清查“五一六”的事，今后不再重现。

□ 《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